

# 北大清华名师演讲录

“两校名师讲堂”编委会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清华名师演讲录/“两校名师讲堂”编委会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

ISBN 7-301-07917-6

I. 北… II. 两… III. 名人-演说-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5253 号

书 名: 北大清华名师演讲录

著作责任者: “两校名师讲堂”编委会 编

责任编辑: 许迎辉 郭 莉

标准书号: ISBN 7-301-07917-6/G · 129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mailto: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排 版 者: 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者: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20 印张 375 千字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 学术委员会与编辑委员会

### 学术委员会

顾 问：张承先、沈克琦、杜建寰、钱振为、  
贺崇铃

主 任：韩向利、郭明瑞、林钧敬、汪劲松

副主任：于文书、张瑞丰、崔明德、段其胜、  
江林昌、韩晓玲、房绍坤、王吉法、  
李建九、程郁缀、王进展

### 编辑委员会

主 编：郭明瑞

副主编：江林昌（常务）、程郁缀、王进展

编 委：姚新喜、戴东风、段治国、于秀国、  
关 涛、张国平、邬旭然

秘 书：栾 浩、孙 进、孙旭涛、张守海、  
祝建军、马 群、周雪莹

摄 影：袁肇君

# 目 录

序言一 .....	1
序言二 .....	5
辜正坤	
中西文化拼合互补论 .....	3
李学勤	
夏商周与山东 .....	31
程郁缀	
唐诗赏析 .....	45
刘意青	
《圣经》的文学阐释 .....	67
邢 文	
解读马王堆:马王堆帛画与过程哲学 .....	81
张 钹	
人类与科技 .....	103
孙富春	
科技论文(报告)写作 .....	117
郭自力	
生物医学的法律和伦理问题 .....	131

许崇任	
转基因生物安全性评价 .....	157
朱永法	
纳米光催化技术及其在环境催化中的应用 .....	187
阎凤鸣	
化学生态学理论和技术进展 .....	219
饶广远	
保护生物学研究的新进展 .....	233
章梅荣	
从线性方程谈起 .....	245
李路明	
航天——梦想、辉煌、挑战、机遇 .....	257
徐卫国	
影响世界建筑发展的潜流 .....	281
代跋——弘扬北大、清华传统,努力培育大学文化与精神 ...	299
编辑说明 .....	303

# 序 言 一

2003年11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支援烟台大学建设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程郁缀教授发言,将他在第六次援建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两校教师到烟台大学举办学术讲座的倡议进一步具体化,得到两校领导 and 与会专家教授们的积极响应与支持,我们将这一活动命名为“两校名师讲堂”。

在北大、清华有关部门领导和老师的热心推动和帮助下,“两校名师讲堂”正式启动。2004年4月26日,清华大学计算机学院张钹院士以“人类与科技”为题,拉开讲堂的帷幕。到8月10日为止,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两校共有19位教授举行了29场学术演讲,内容涉及语言、文学、法学、考古学、数学、生物学、化学、计算机、建筑学、土木工程、航天工程等十多个学科门类。演讲在烟大校园里引起极大反响,有近12000名学生聆听了两校名师的精彩演讲,占了烟大在校生的一半之多。有时演讲厅通道和地板上都坐满了学生,许多学生在演讲结束后围着老师提问,久久不愿离去,场面令人感动。

烟台大学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两所我国一流大学直接援助建立起来的一所新型地方综合性大学。虽然到目前为止仅有短短二十年历史,但当年两校几十名校系领导和上百名授课教师六年开创性的工作,构筑起了作为一所大学应有的集教学、科研与服务社会诸功能于一体的基本框架。北京大学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和清华大学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大学精神也随之带入烟大:日积月累,相互交融,发展为烟台大学校园文化的主流;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植根于烟台大学办学理念的深处。如果说烟台大学与改革开放以来别的新建大学有什么不同,如果说烟台大学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十多年中保持了较高的教育教学水平和发展速度,追根溯源,是两校深厚校园文化底蕴熏陶浸润的结果。这正是我们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精神之源,是我们能够不断开拓进取,朝着高水平地方大学迈进的动力之本。

如何在新形势下继续保持和发扬北大、清华援建的资源优势,如何实现烟台大学与北大、清华在各个领域和层面上的交流互动,让烟台大学的学生们不出校门就能够听到两校教师的学术讲座,一睹名师风采,开阔学术视野,激发创造热情,立志创业成才,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思考和不断探索实践的问题。虽然我们过去也邀请了包括两校教师在内的国内外教授学者来校做学术报告,但“两校名师讲堂”的听众如此之多,学科如此广泛,时间如此集中,影响如此之大,却是以前从未曾有过的。从一定意义上讲,“两校名师讲堂”无异于把北大、清华两校高水平的学术讲座“克隆”到了烟台大学,成为我校学生获取与补充知识信息的重要一环,两校长期支援烟台大学的一个载体,烟台大学与两校校际交流互动的平台,三校各院系间沟通联系的一条管道。我们可以从上学期“两校名师讲堂”开讲以来所收到的实效窥见一斑:

——烟台大学学生了解各学科知识的兴趣增强,理解力提高,更加主动地思考问题,捕捉学术信息,促进发散性思维。讲堂开始阶段,学生还是被动地听讲。听了数讲后,学生开始与教师交流,提出了各种很有水平的问题乃至不同的观点,令演讲老师赞叹:烟大学生素质不错!是这许多讲座,打开了学生的视野,把他们带到了学术前沿,促进了他们人文修养与科学素质的提高。

——烟台大学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得以提高升华。两校老师在演讲中,既教书又育人,寓育人于教书之中。北大程郁缀老师讲到母爱的伟大无私,信手拈来几首古代诗词、几则中外故事,使全场听众为之动容。以至在之后的母亲节那天,一位听过这次演讲的学生问辅导员:你给母亲送花了吗?名师们的美好情愫和人格魅力,将会长久地影响烟大学子。

——烟台大学与两校院系间的交流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过去烟大与两校的交流关系大都是在校级层面上开展的,院系之间缺乏深层次的交往互动。通过“两校名师讲堂”这个平台,一些没有与两校建立联系的院系从此建立了联系,一些已有联系的院系合作范围扩大了,相互交流加深了。外语学院过去长期想请北大外语学院老师讲学而未能办到,这次一下请来辜正坤、刘意青两位著名外国文学专家。清华大学朱永法教授在讲座期间到我校催化研究所,具体指导该所科研工作突破口的选择。张钹院士更表示要把下一步科研合作的重点转移到烟台大学。这就在更大范围上推进了我校与两校间合作交流的深化。

因此,我们十分珍视“两校名师讲堂”在学生培养教育和与两校交流互动中的作用。为了彰显和以多种形式体现“两校名师讲堂”的初步成果,扩大它的影响,让更多的烟大学子受益,我们在两校演讲老师的支持下编辑了这本《北大清华名师演讲录》,收入了十五位老师的演讲稿。随着这项活动的持续开展,演讲录还会一辑辑地出下去,而“两校名师讲堂”也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受益的将不仅是学生,它的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

是为序。

烟台大学校长 郭明瑞

2004年9月

## 序 言 二

今年金风送爽的时节,烟台大学三万余名师生将欢庆建校二十周年。对于个人的生涯来说,二十年是相当长的段落,但于一所大规模的高等学府而言,这只是其新创的时期。正因为这样,我们走进烟大,处处会感到新的气息。校园是新的,楼馆是新的,设备是新的,更重要的是精神面貌是新的。整所大学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兴气象。

烟台大学始建于改革开放以后,建设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她虽然全系新建,没有旧校的基础,却不是无所凭借。烟大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一起始便得到清华、北大的帮助和支持。烟大人不会忘记,北大、清华的领导、教师来到烟台,直接参加烟大的筹备缔造,并且担当了大量工作和课程。所以烟大的成立与发展,在多方面吸取了北大、清华的积累和经验。烟大同这两所大学的关系,可说是非常密切而深远。

北大和清华,众所周知,都有其长久的历史、传统的学风。这些年,颇有若干作品分析讨论两者的特点,有的说“清华是李白,北大是杜甫”,有的说“北大是清泉,清华是岩浆”,均可谓生动的比喻。烟大在建校的进程中,注意兼取两所大学之长,促进自己的成长发展,其效果至今已为人所共见。特别令人高兴的是,烟大与北大、清华间的合作交流,二十年来一直绵延持续。其中一种重要的举措,就是经常约请北大、清华的学者到烟大讲学。现在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的这部《北大清华名师演讲录》,具体记录了这项工作的内涵。烟大的领导认为,这是清华、北大援助的继续。

这部书收录的十五篇演讲,涵盖了文、理、工各科。讲演者系由烟大校方或学院、系所分别聘请,而所讲的内容则有其共同的特点,即指导性和前沿性。讲演者均为有关学科带头的专家,老中青都有,都从本人的工作实际出发,论述了学科领域最新的进展趋向,使听众的视野得到开拓。不少演讲还专门讨论了学科的方法论问题,对听众的启发尤为深刻,充分体现了讲演

者的苦心。这一切当然不仅有益于烟大师生,对本书的读者也一定会有许多帮助。

我自己并没有受组织指派参与烟大的创建。有些读者或许知道,我本来是清华学生,1952年到中国科学院(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90年代初,我在母校建立国际汉学研究所,到1998年,在烟大组建了中国学术研究所,去年秋天,我的工作正式调到清华。所以现在在我应烟大领导之命为《北大清华名师演讲录》写这一小序,很荣幸地有着双重的身份。

借这里的篇幅,谨对烟台大学建校二十周年表示祝贺。

李学勤

2004年9月17日于清华园

# 中西文化拼合互补论

时间:2004年5月21日

地点:烟台大学法学院报告厅

## 一、澄清概念的重要性

这个题目首先涉及概念的澄清问题。“中西文化拼合互补”这种提法,在我之前还没有人用过。人们自然而然地会问:为什么舍弃大家都用惯了的“融合”这个字眼而用“拼合”这个说法?是不是故意标新立异?“拼合”与以前讲过的“融合”有什么区别呢?我的回答是:当然是标新立异。不标新立异引不起人们的重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标新立异本身这种做法,而在于这种新,新在何方?异,异在何处?没有特殊价值的新和异都是不可取的。“拼合”、“融合”就是一个字之差,它的特殊价值在哪里呢?这正是本文要花大力气加以阐明的。

学术研究往往不可避免地要从厘清基本术语、尤其是关键术语的异同入手。人们可能会觉得“拼合”与“融合”虽不同,但是大同小异,可以相互代替。我的研究却发现,中国近百年来在哲学、

美学、政治、经济、文学、伦理、历史、医学，乃至建筑、饮食等许多文化层面的学术理解与实践措施上的偏差与误区，都与这两个概念没有澄清有密切关系。这两个概念看似雷同，实际上在实质上和实际操作中的效果有很大的区别。因此澄清这两个概念，阐明它们的实际应用效果，对我来说，是当前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与发展建设的首务。

澄清概念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引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就是“哲学问题往往是哲学语言的误用产生的”，事实上许多所谓的哲学问题并非真正的哲学问题，而是由于语言的误用才导致了一连串的问题。推而广之，很多学术问题也是这样，往往是由于术语的界定不周造成的。有时一个概念弄明白，整个理论构架的基础就自然明白。概念之争往往是学术研究的焦点。焦点问题弄明白，整个理论构架的缺陷或优点随即暴露无遗。让我在这里先举一个典型的与本文所论题目密切相关的例子，然后再回到“拼合”与“融合”概念的讨论上来，以加深对本文观点的理解与把握。

## 二、从“现代主义”之类的术语看澄清概念的重要性

比如“现代主义”、“现代化”这些概念（Modernism，中文译作“现代主义”），就是一帮故弄玄虚的学人硬生生造出的学术行话，让它至少在西方和东方的学术界独领风骚百年之久，而很少有人质疑。其实这个术语，在逻辑上有致命缺陷，在表意上扑朔迷离，令人似懂非懂，误导性极大。此词的词根 Modern 的含义有“现代的”、“摩登的”、“新颖的”诸种意思，作为一个形容词使用当然无可挑剔。它的主要用途是向人陈述时间的先后，比如我们说，现代道德，现代环境，现代风俗，现代作品……我们是针对道德、环境、风俗、作品出现的时间段而言，使之与非现代或古代相区别，表明这些东西产生在离我们较近的时限之内。我们当然可以使用这样的术语，但是我们做这种陈述的时候，切记现代这个字眼本身不应该含有价值判断，即不能暗示凡是一种道德出现在现代，就是好的，或者凡是一部作品产生于现代，就优于古代作品，或者凡是一种环境处于现代，就比古代的环境更优美，如此等等。因为我们知道得很清楚，产生在现代的道德、环境、风俗或作品等等，有的可能优于古代，有的则可能劣于古代。假如现代道德必定优于古代，那么何以人们总在惊呼现代人或当代人的道德世风日下，其人格水准日益低落呢？假如现代环境必定总是优于古代的，那么，何以人们痛心疾首地哀叹现代污染的环境，奋力倡导恢复生态平衡呢？假如现代作品必定优于古代作品，何以人们总在抱怨唐诗宋词的盛世不再，荷马或莎士比亚式的作家一去

不返呢？原子弹、生化武器、温室效应、电脑病毒够现代的了，我们能够说它们是好的吗？因此，在使用“现代”这个表达时间概念的形容词时，我们只应该把它作为一个中性词，让它客观地表达时间长度或时间段，而不能赋予它主观的价值判断的意味：因为——如前所述——产生在现代的东西不一定总是好的或坏的，美的或丑的。这应该是一种十分浅显的逻辑道理和起码的表意规范要求。然而，一旦某些西方学人将这个词根强行加上-ism(主义)这个后缀，从而造出了 Modernism 这个用语，问题便接踵而至。首先，Modernism(现代主义)是什么意思？假如它是暗示凡是现代的东西都优越于古代的话，则其荒唐性已如上述。假如它只是暗示某些现代的东西(例如工业管理、科学技术之类)优越于古代的话，那么它就只能被具体地说成诸如“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或“科学主义”(Scienticism)之类；如果它主要是指文学创作方法上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话，它就应当被具体地称为“文学科学主义”(Literary Scienticism)。如此等等。简而言之，这个术语绝不应该霸占住整个“现代”时域内产生的一切现象。这在逻辑上叫做肆意扩大概念的内涵或外延从而达到偷换概念的目的。Modernism 一术语的炮制者有意或无意地将现代的某些现象暗中偷换成现代的一切现象之后，误导的作用就极其严重了。它有可能使人们顾名思义地把产生在现代的某些适用的原理或主张扩展到人类现代生活的一切方面。中国的学人不假思索地将 Modernism 翻译成“现代主义”，因而也就传染上了上述同样的西方语病。此不赘述。有很长一段时期，西方学人大叫现代主义，东方学人也跟着大叫现代主义，老百姓自然无法判断这些学术行话的弊端，一窝蜂地“现代主义”起来，终至于使“现代”两个字扬眉吐气，同时使“传统”两个字与“保守”同义，让人感到凡“传统”者，似乎必与落后甚至反动联姻。传统派因此近百年来，几乎没有过一天开心日子，总是窝窝囊囊，被现代主义派视为生活中一切弊端的替罪羊。在中国学术界有很多这类术语是翻译过来的，没有清楚的解释，到后来就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

再比如“优胜劣汰”这个术语，在当代往往被人理所当然地理解为“胜者应为王，败者当为寇”。然而胜出的一方就一定是好的、优的吗？失败的一方就一定是劣的、不好的吗？这是明显片面的。在一些场合，善不断战胜恶；可是在另一些场合，恶也在不断战胜善。善恶往往交相胜。然而“优胜劣汰”这个为许多人不知不觉认同的术语带着一种武断的误导性的价值观，它暗示这一原理可以推而广之地应用到许多场合，从而使人片面地去追求“胜”，以便被社会自然而然地视为“优”；或者极力使自己不被“淘汰”，以防自己被社会视为“劣”。在体育场上、在考场上，也许这是健康的心态，可是

当面对金钱、名誉及其他利益分配时，拼命去争、去抢正是我们鄙弃的心态。也许，用“强胜弱败”这个词要好一点。强者不一定是好的，弱者也不一定是坏的。总之，这类术语的误用导致误导的例子很多，由此还引起“古今之争”、“现代化与本土化之争”等等。不赘。

### 三、融合论的历史回顾

下面我们回到拼合与融合的讨论上来。关于中西文化融合的讨论远不是现在才开始，事实上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我打算从中西文化的关系方面入手来看待这个问题。在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学者大致上可分为三大派：本土派或者叫守成派、融合派和西化派。它们之间有些是交叉的。

守成派指所谓的保守派，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弱，应该以中国文化为本，适当吸收一点西方文化就行了。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西方的文化落后于中国文化。守成派的学者很多，比如明朝的李王粲、许大受，清朝的阮元、纪晓岚、允禄，另外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张之洞，他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其实这种观点是守成与融合思想兼而有之。张认为西学可供“采补”，想“择西学之所以补吾闭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病者取之”。但是得“西学先由中学”。还有辜鸿铭先生，他用英文写了《中国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这本书，认为中国文化在很多方面优于西方文化。另外还有熊十力、牟宗三、孙家鼐、伦父等，这些人的主要倾向都是守成派。

融合派比如徐光启，他在三百多年前，就提出“超胜”论。他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徐光启在1631年春上呈的《历书总目表》中，提出了翻译西洋历书必须分别轻重缓急，循序渐进的见解，并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臣等愚心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翻译才能“会通”，只有“会通”才能“超胜”。这里的“会通”就包含融合的思想。把别人的长处拿过来，结合自己的长处，那样不就更好了吗？康有为、梁启超也是融合派。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讲“东方精神，西方物质”，意思是东方的精神占上风，西方的物质占上风，二者可以融合。关于融合谈得比较多的是钱穆。他的著作很多，是个典型的融合论者，他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若不解决“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而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光大与更充实”这一问题，那么“中国国家民族虽得存在，而中国传统文化则仍将失其存在”。李大钊也谈到过“东方精神，西方物质”。民国时期，王新命、何炳

松、武靖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儒、樊仲云、萨孟武这十位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俗称“十教授宣言”。其思想也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吸收西方文化，融合为一体。另外还有胡秋原、张季同、唐君毅、张君勱、孙中山、冯友兰等都是融合派。

第三派是西化派，他们侧重搬西方的文化。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大家也都很熟悉：鲁迅、陈独秀、胡适等。胡适一开始主张全盘西化，后来思想有所转变，但他骨子里还是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他明知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但还是主张“矫枉必须过正”，因为他想“让中国文化的情性来消减西化，可以取法乎上，得其中”。就是说先要走得极端一点，造成一种文化西化的状态，之后再慢慢纠正。陈独秀走的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路子。鲁迅、陈独秀可以说是西化现实派，主张学习西方的体制、技术等。

#### 四、拼合论的理论依据

刚才大致勾勒了一下这三派的情况，许多情况是大家知道的，没有多少新东西。但是经我这么一勾勒，却让我们发现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没有人质疑“融合”这种说法的局限性。全盘西化论者也好，守成论者也罢，他们都认为取长补短，融合东西文化的可能性是理所当然的。多少年来，我们大家都这样说惯了，见惯不惊，不觉得这样说有什么不妥。我从前也糊里糊涂地用过“融合”这种说法，没有质疑过它。我是在90年代初才发现问题的。我的发现是：就融合概念而言，这三派对中西文化如何建设的对策在认识上有颇大的缺陷。

融合是一种客观现象，有时很必要并且确实能够产生好的效果。比如杂种就是一种融合结果。骡子是马和驴杂交的产物，就能兼有马和驴的一些长处，例如高大壮实，尤其是不怕累。生物界还有许多杂交的品种证明融合的优势，可谓之杂种优势。但是这样的经验不能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加以类推，误以为两种不同的事物都是可以融合而产生好的效果的。在文化建设上，特别要注意不能简单运用这种杂交原理。因为文化现象和生物现象在杂交融合上的共通性和差异性是非常复杂多样的，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可融合者，有不可融合者，有大半可融合者，有小半可融合者。凡融合不了的成分，即可用拼合法。拼合法的情况也一样，有宜拼合者，有不宜拼合者，有大半宜拼合者，有小半宜拼合者。因此拼合法与融合法必须交相使用。就我目前的研究结果而言，在中西文化这两个系统之间，

由于其文化致同因子<sup>①</sup>(现在有人称之为文化基因)差别很大,故我们看到拼合法应用的空间更大些,也更合理些。中西文化基因的最大差别:中国: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家族社会结构所导致的德性文化(如德治—礼治—克己—和谐—中庸—不争—顺其自然等价值取向)←→西方:以个人或党派利益为基础的国家体制结构所导致的征服性文化(如法治—力治—竞争—技术崇拜—征服自然等价值取向)。

生物杂交与文化杂交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需要注意:生物杂交后产生的杂交品种可以和没有杂交的其他品种同时存在,而文化杂交后,杂交倡导者却往往只倡导所谓杂交品种存在,主张淘汰掉原来的文化形态。近百年来,中西哲学、艺术、政治、经济、文学、语文乃至建筑等等都无一不具有这种惨痛的经历。

我可以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从色彩的角度来看。我们现有红、黄、蓝三原色,如果把红色和蓝色融合起来,就得到了紫色。但是我们要注意:在我们得到紫色的同时,却失掉了原来的红色和蓝色。我们把红色和绿色融合在一起,得到黄色,蓝色和绿色融合得到青色,蓝色和黄色融合得到绿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融合后得到的是一种颜色,失掉的却是两种颜色。文化建设上,应该有融合,关键是要掌握好融合的程度,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使用融合的方法,在什么场合下我们不应该使用融合的方法。如果融合会使我们失掉更多的东西,那就不要融合,宁愿使用拼合的方法。所谓拼合,就是把红色、蓝色并置放在那里,两种颜色你都可以得到,不必为了一种颜色而丢掉其他更多的颜色。假如你确实还需要第三种杂交颜色:紫色,那就把两种颜色融合,但同时记住:拥有杂交色紫色后,不要把前两个母种颜色丢掉。就像父母生出儿子以后,父母仍然有存在的价值。但是有的学者在谈“融合”的时候,潜意识里不知不觉只要一种东西,即只要儿子,不要父母。例如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一融合,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他们主张只要这种新的文化,抛弃原有的母体文化。此外,这其中的“一种”也是误用,不能说“一种文化”,文化是多层面的东西。按照他们的观点,中西文化融合出的这种新文化是什么文化呢?它既不是西方文化,也不是中国文化,是兼两者之长的一种新的文化。这听起来不错。但是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实际上这种文化很可能会既失掉了中国文化的长处,又失掉了西方文化的长处。如果可以作价值判

<sup>①</sup> 文化致同因子的概念是我在1988年在《三欲先天原动力论与人类文化的发展》讲演稿中提出来的。

断的话,这种新的文化的价值是否优于前面的两种文化,是很难说的。有可能刚好是短处相加,而非长处相加。例如元代蒙古族的文化就是试图融合唐宋以来的文化,在一定的程度上,融合现象是产生了,但是融合后的文化整体优于前者吗?换句话说,元代文化从总的质量上优于唐宋文化吗?我觉得事实上刚好相反。但是如果我们用拼合的方法,就能兼存二者的同时并得第三者。所以我认为,拼合的办法是更好的办法。只走融合而不拼合,则得一失二;只走拼合而不融合,则孤阴不长,孤阳不生,也不妥。融合能接出杂种,这不可否认。杂种也有其优势。但是融合应该是有条件的。融合可以增加种类,然而种类又不能过多,中庸为宜。颜色也是一样,赤、橙、黄、绿、青、兰、紫,七色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理想的色彩范围,如以此为据,自然进退自如。要明白在文化建设上拼合常常优于融合这个道理,我还必须用更多的具体例证从若干层面上来进行阐释。

## 五、从中西哲学角度看拼合论

中国哲学侧重人的心性修养,可以说是和道德伦理探索同源的;而西方哲学侧重对外部世界的探索,往往与科学同源。所以中西两种哲学一开头就不是在同一个出发点上。西方人动不动就说哲学起源于惊奇,哲学是爱智慧之类。而对中国人来说,哲学却多和具体的人事相关,哲学必须解决人类社会的具体难题。

尼采曾经说过,中国哲学是安宁快乐的人生哲学。而西方哲学呢,则刚好相反,是侧重研究死亡和痛苦的哲学。

在对待自然与人的关系上,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合一论,主张与自然和睦共处。从中国哲学里,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推导出当代的生态环境观。而西方哲学则强调天人相分论,主张人定胜天,掠夺自然、榨取自然成了西方文化逻辑的必然走向。

在心物关系上,中国哲学强调心物一元,或心物一体,不强调二者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精神是物质,思维与存在是同构共体的。而对于西方哲学来说,心物关系是二元的,不是心决定物,就是物决定心,二者是非A即B的关系,没有调和的余地。所以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成了两大不可调和的哲学流派。

在真理观上,中国人倾向于认为真理是多元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而西方人更倾向于认为真理只有一个,不是错,就是对,没有第三种可能。